

引 言

北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三千余年。事实上，北京的前身蓟城并不是自周初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才开始的。早在商代，蓟作为殷商北方属国即已长期存在，并且也以蓟为都城。如果考虑到商代至少是商代中期以蓟为都的事实，北京的历史大约在 3500 年左右。这是因为在奴隶制时代，作为方国都城的蓟也已具备了城市的功能。这应是一个类似于考古学在湖北黄陂发现的方圆仅二里上下的盘龙城商代故城的小城。

历经商周更代，蓟作为周初“兴灭国、继绝世”的地方封国，仍然沿用了昔日的旧城。春秋时期，蓟国被日渐强大起来的北方山戎族灭亡，蓟城遭到破坏。唇亡齿寒，与之毗邻的燕国，即周初分封召公于北燕的方伯大国，首当山戎继续南进之兵锋，固有“山戎病燕”，及“燕外迫蛮貉，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的文献记载。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燕一度迁都于临易，并发生了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解除山戎南下军事威胁，燕国迁都于蓟的政治历史事件。事在燕庄公至襄公时期。自燕国迁都于蓟至灭亡于秦，蓟城作为燕国都城长达四百余年，故有燕都蓟城之称。

经此四百余年的发展，又经秦王朝的短期统一及西汉前期的的发展，蓟城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已是南通齐《山东）赵（河北南部及山西中北部），东北与乌桓、夫余等民族毗邻，既有鱼盐枣栗之饶，又统东北之利的一方都会。而在著名的《盐铁论》中，更将燕之涿、蓟（蓟城）与当时的通都大邑如邯郸、临淄、荥阳、宛丘、洛阳、阳翟等并称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由此看来，战国以降，蓟城已是当时国内为数并不多的著名都会之一。

魏晋至隋唐，中间虽曾经历过十六国北朝分裂割据政权的统治与破坏，但蓟城位于中原、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及黄土高原交接地带和农业文化与畜牧渔猎文化过渡地带的特殊地理区位，及贯通各大地理单元之间的交通形势，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因而蓟城一方都会的地位始终也未动摇。只是政治和社会治乱制约下的经济与文化繁荣的程度有所升降嬗变罢了。因此，自战国以迄隋唐，蓟城始终是以幽燕地区都会的城市职能和城市面貌出现的。而军事重镇只是一方都会蓟城多种职能中的一种职能而已。

也正是由于蓟自燕都之后至隋唐幽州治所的一千五百余年间，在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在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渔猎文化的长期对峙、交往、碰撞、融合过程中，一直扮演了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一方都会角色，才逐步迎来了在此建立帝都的曙光。此后，又经过数百年的演进发展，终于赢得了封建一统帝国都城地位、历时也已达七八百年。如果古老的蓟城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具备的仅仅是军事重镇职能，充其量只配作“藩镇”城，要上升为政治文化中心是很难想象的。

为客观历史地反映出幽燕都会蓟城演进兴衰的全貌，本书拟从该都会城市的奠基、兴起、嬗变与发展四个历史阶段叙述政权兴替、社会治乱、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认知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及其成长繁荣凌驾于其它都市之上最终成长为中华一统国家都城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是，由于城市是区域中心，区域又是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基础，二者关系密切；同时，由于缺乏直接用于阐述城市发展历程的史料，故在叙述城市的成长历程时，不可能割裂区域与城市的联系而孤立地讨论城市，因而通过探讨区域发展来揭示和反映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势所难免。

仍须提及的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太史公首称蓟城为“勃碣之间一都会”，勃即勃海或毗邻之勃海郡；碣即碣石，在今辽宁绥中西南，为一低山。二者均偏在蓟城以东，故谓蓟城为“勃碣之间一都会”未必恰当。而燕山及毗邻之山南地区自古即有幽陵、幽都及幽州之称。《尔雅·释地》“燕曰幽州”；《周礼·职方》“东北曰幽州”均视幽州为古代“九州”之一。西汉幽州为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即十三州之一，自东汉至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幽州，隋时幽州总管府，唐与五代幽州，均以蓟城为治所为中心。幽州由区域概念到行政区划名称，直到后晋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地赂辽，辽朝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才被取消且未得恢复，因而沿用了一二千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燕最早是指燕山而言，至商代在今北京市域南部形成因燕山得名的殷商属国旻，旻又作𡇗。武王克商灭旻，成王又封召公于燕，是为西周属国，至春秋迁都于先已被山戎灭亡的蓟国都城蓟。历经

春秋战国的拓展，燕国已占据了古代幽州大部分地区，又是核心地区，故而蓟城又有燕都或燕京之称，在历史上影响亦甚大。幽、燕在地域上某种程度的重合及其在古代和对后世的影响均远过勃、碣，故而本书指称蓟城不取勃碣都会，更不取军事重镇，而正名为“幽燕都会”。

一、奠基

1. 蓟与蓟都

北京地区为远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自距今 70 万年以来，即先后出现了“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东方广场古人类”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经过连续的发展至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至平谷上宅和北埝头遗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幽燕腹地，不仅出现了原始农业，而且还出现了原始聚落。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北埝头遗址发现的十座半地穴式房址及在昌平雪山二期文化遗存发现的三座半地穴式房址，表明了北京地区人类定居生活的开始。

与西安半坡早期聚落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但北埝头原始聚落稍晚。其主要差异在于遗址中房址的多少，规模大小及有无防御设施的围沟上。一般认为，西安半坡聚落已拥有有力的防卫设施和内部功能分区，及一定规模的制陶手工业、建筑业和农业，可视为早期城市的雏型。而距今八千至七千五百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不仅规模

大而且亦有大型围沟环绕，从而将我国北方地区原始聚落的兴起和发展的时间上推到七八千年以前。早期聚落由小到大，由无防卫设施到有防卫设施是人口增长、生产力提高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作为蓟前身的原始聚落至迟也应该出现于六千年以前、即北埵头原始聚落出现的时期。

按“蓟城”前史研究的成果，蓟的来源与黄帝部落及其后裔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按照我国古文字学的解释，“蓟”字的构成，从草（按取草头）从鱼又从刀，古代从草即从术，术是一种粘稻；故“蓟”是一个以刀为生产工具经营农业、兼营渔业的早期族称。按古代文献的记载，北京及其邻近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是黄帝之子禹京之后，也就是兼营稻作和渔业的蓟族^①。根据考古学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近水而居，赖台地、阶地及冲积扇黄土谋生的地域分布及其附近多河网湖沼的环境特征，恰与蓟族经济活动的方式相适应。说明蓟字来源的解释和文献记录的古史传说均是可靠的。

古代地名来源于长期生聚的部族的族称即“名从主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命名方式之一。蓟族长时间生聚中心地区的台地丘岗叫作“蓟丘”河流称作“蓟水”就是古代部族名与地物名相结合的地名。蓟族首领生息的聚落自然就赢得了“蓟”的名称。蓟就是蓟城兴起之前的原始聚落。

要确切地指出原始聚落蓟的具体方位，是很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太久远，没有文字的记录；在出现文字之后，口语或传说地名在转变为文字地名的过程中又未能明确

李江浙《蓟城前史初探》，《京华旧事存真》第二辑 1992年。

记录下来。但根据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可以作出推测。

黄帝是古史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生当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距今约五千年上下，在北京地区大致相当昌平雪山遗址一期文化时期。当时，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战败炎帝，又在涿鹿击杀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就发生在北京附近地区。因此，北京市域及附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若干黄帝史迹传说，绝不是偶然的。联系雪山一期文化尤其二期文化与周边地区、包括中原、山东、桑乾河支流壶流河流域、燕山南北等地密切的文化联系及其交汇融合的物质文化面貌，黄帝及其子禹京和禹京后裔即蓟族最初生息繁衍的中心当在雪山台地上，这个台地当即早期的蓟丘，在此形成的原始聚落或即称作“蓟”；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地方性奴隶制小国蓟。至殷商时期臣属于商朝，为一宾服方国。刘玉奎《新增都门纪略》称都城以北百余里有“蓟丘”当即雪山文化所在之台地。

盘庚迁殷之前，商人“不常厥邑”的习俗亦影响到其北方属国蓟，或者因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蓟人原本也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族。古史传说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均已表明，黄帝本人的活动地域及其后裔建立的奴隶制方国蓟均曾发生过迁徙与转移，因而在河北涿鹿、在北京平谷均有黄帝史迹与传说，古代在昌平西部及北京城西南部均有蓟丘地名，在北京西部还有蓟水等。这些史迹显然都与早期蓟人主要活动地域有关。从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夏商时代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来看，雪山三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附近应该是夏商时期蓟人活动中心地区或即蓟都所在地，商代中期以后，蓟人活动的中心开始转移到卢沟河洪积冲积

扇上来，并在这里形成了蓟丘、蓟水等地名。地名随主人迁移在中国古代是常见的社会人文现象，也是“名从主人”地名命名规律的组成部分。蓟族部落首领所居中心聚落蓟自然也应该按此轨迹转移，并且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成分的扩大和交通枢纽的确立，最终在卢沟河冲积扇上形成稳定的聚落。

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表明，聚落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城市又是聚落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聚落都可以成长为城市。只有那些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优越交通条件的聚落，才有可能成长为城市、甚或区域中心城市。这就是说，古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的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其所处的交通区位息息相关。

上述雪山、刘家河及后来的蓟城所在地的文化遗存均位于海拔 50 米至 100 米等高线上下的山麓洪积冲积平原或山前台地上，属早期人类活动的主要地域范围，同时又都位于古代交通要道上。其中平谷刘家河遗址恰恰位于自中原北上经平谷盆地北沿通往东北地区的交通路线上，这条路线东出山地入卢龙道；雪山及蓟城所在地方则均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线北段不同时期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分歧点上，因而赢得了不同时期交通枢纽地位，从而推动了这些地方聚落的发展及文化面貌交汇融合特点。其中又以后来长期延续且定向发展的聚落最终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因此，在蓟城出现之前，原始聚落蓟即已形成并曾迁徙过，而且还是蓟都所在。其作为方国国都，同样应该具备了早期城市的功能。由此看来，蓟城的早期历史至少还应上溯到商代蓟都时

期。经过商代数百年的发展，才为武王灭商封黄帝之后于蓟奠定了基础。因此，将文献记载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年代作为蓟城建城之始、并把 1995 年作为蓟城建城 3040 年，结论未必恰当。理由是，蓟无论在周还是在商均是方国都城，何以在周为城，在商就不是城？主蓟在周为城在商不为城者显然出于主观臆断，并无科学依据；武王克商并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年代，截止本世纪 80 年代已有 20 余种说法，轻取其一而定论之，证据亦显不足。

按《吕氏春秋》的记载，周克商之初，“封国四百，服国八百”，可见周初封国之多。按当时封国的性质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追思先圣王而褒封其后裔的封国，其作用在“兴灭国、继绝嗣”笼络先王后裔稳定周初统治。这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因地方势力或方国就地封赏、仍然由其首领管理统治的“宾服”地位，类似于唐宋边远地区的羁縻制度和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恰恰属于这种类型。《史记·周本纪》谓封“帝尧之后于蓟”是一回事。帝尧原本也是黄帝之后。

这些文献记录及北京地区有关黄帝的早期传说与史迹，以及蓟的来源，均有力地旁证了周初封黄帝之后于蓟，是无庸置疑的史实。

蓟作为“宾服”之国，在周初仍然是弱小的，一如商代。历西周，至春秋初期蓟国灭亡。蓟的灭亡不是亡于燕，而是亡于北方山戎的南下。山戎是长骑射善攻掠以畜牧为主的部族，至春秋初期日渐强大，故在当时文献中常有山戎侵燕、甚至越燕伐齐的记录。按《史记·燕召公世家》有“燕外迫蛮貉，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

矣”的记载，位于燕国以北的弱国蓟已先期灭亡，燕才成为山戎的直接攻掠对象。

至于在当今北京所在的卢沟河洪积冲积扇上至今未能发现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蓟城的重要文化遗存，但也不能随意否定其存在。综合考察，至今尚未发现商周蓟城重要文化遗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北京地区地质运动和卢沟河河性共同导致的河流泛滥改道对早期文化遗存的冲蚀与淹埋，战国文化层在宣武区被埋藏地下 7 米处，距今仅七八百年的金中都南水门被淤埋在五六米以下的事实，便是很好的说明；二、自古以来蓟城所在地区的开发强度和城市的反复建设是毗邻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开发及城市拓展带来的遗址破坏相当严重；三、按商周时期“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仪）”^①的王制及商代南方方国都城、湖北黄陂盘龙城的规模推测，商代蓟都方圆也应在二里左右，是一小城，并且为西周时期的蓟国所沿用。这一小城显然容易遭到破坏和改造。

2. 燕与燕都

《史记·周本纪》说：“燕、蓟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图 1）蓟已如上述，燕即《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北燕即北方燕地，亦即所谓因燕山为名的北方方国，在甲骨文中称作“𠄎”。甲骨文中常见的“𠄎来”卜辞及“妇𠄎”不仅是早在商代

^①《荀子·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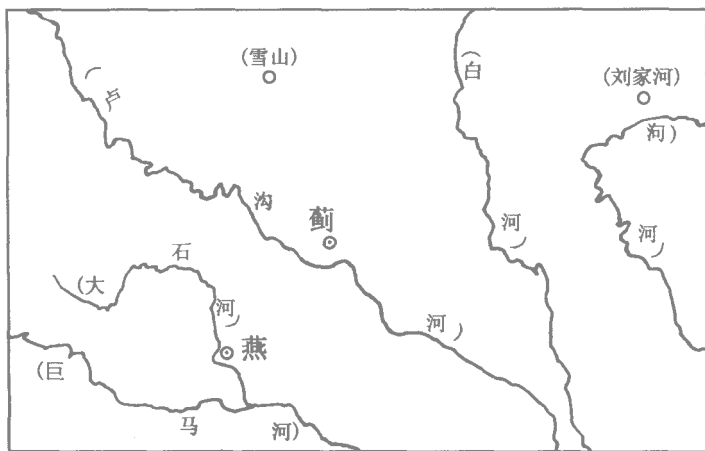


图 1 西周蓟燕相对位置图

“晏”国即存在的实证材料，而且说明了“晏”是比蓟与殷商王朝关系更为密切的殷商北方属国。概因其与商朝关系过从甚密，在武王灭商过程中被灭掉了，因而有“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①的说法。由此可见，燕与肃慎、亳等均是武王灭商从商人统治下拓展的疆土；而蓟却不同。蓟作为先圣王黄帝之后创立的方国，到西周仍然受到褒封。这里的燕亦即甲骨文及金文中的晏，又作𠄎或𠄏，因晏、𠄎与燕的音义在古代相同故《史记》、《春秋》、《左传》等早期史传著作均记作燕。而在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出土的铜器铭文中燕与𠄎通假，更证明商代燕的存在。

周初分封召公于商代燕地，已不属追思先圣王、褒封其

^①《左传》昭公九年。

后裔，而是《荀子·君道》所谓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的封国，其作用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①这七十一国除封建之周朝宗室五十三人即五十三国之外，还有周王亲戚与勋臣，因而是周初分封的主要国家，号称方伯之大国。周公之鲁，召公之燕，管、蔡、霍三叔之国均属宗室封国，而姜太公之齐则属勋臣受封。封建亲戚、藩屏周朝则是周初分封的另一种类型的封国。

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鬲与青铜盃内有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均记录了周王褒扬太保召公、册封燕侯及授民封疆的内容。其中“令克侯于燕”不仅证实了《史记》有关召公受封于燕记载的正确，而且说明了商属燕国存在并于周初已被灭亡的事实。周初封召公于北燕就是封于旧燕地，故仍称作燕。

由长篇铭文的内容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召公封燕，其属民与封域除商代旻人土众之外，还有附近羌、马、微、克等其他九个国族，因周初燕的封域远较商代旻国大，故是为镇抚一方的方伯大国，即《尚书》所说的“孟侯”之国。二、实封或就封的第一代燕侯又称旻侯不是召公，而是召公元子克，盃、鬲铭文可证；同时，实封时间也不在武王灭纣之时。《史记·周本纪》与《燕召公世家》均将召公封于燕或称北燕的时间系于武王灭商应该是对的，克商之后论功封赏符合古代王者庆功之常例。问题是商纣虽被推翻，但东方殷民势力还很大，为防范与镇压其反抗，武王留周、召诸公于身边辅佐朝政显然较派他们去镇守一方更重要，因而他们均

^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未就国。武王克商后七年病死，幼子成王即位，周公监国或称代行天子事。同时分封并已就国的管、蔡、霍三叔流言反周公，煽动武庚及东方殷商旧贵族叛乱，因有周公、成王东征南伐之举。周公旋师返政于成王，受命营建洛邑，而召公代为首辅，因又有召公统兵北伐，“辟国百里”，^①平息了北方殷民及殷属各国族的叛乱包括燕人的叛乱。时在成王十年之后。抚定北方，稳定周初统治，召公居首功，因而在周王册封燕侯的盃、鬯铭文开首就颂扬召公，“王曰：太保，佳乃明，乃鬯（chàng）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燕”。太保是成王时召公的官职，可能就是召公抚定北方后的特授，可知此处的王系周成王。成王褒扬召公忠诚贤能，除继续留任太保辅佐周王外，仍承认武王的册封，令召公兼燕侯之爵，但由召公元子克就国，犹周公元子伯禽代周公就封鲁国。克就封燕应在成王十五年前后。由此可证武王封召公于北燕不误，但未就国。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史实的最有力的证据则是在琉璃河遗址中出土的“董（jīn）鼎”所铸26个字的铭文：

匱侯命董僕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董贝，
用作太子癸宝 樽鬯^{S15}。

这里的匱侯就是代召公就封于燕的第一代燕国国君克，宗周即西周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太子癸当是匱侯克的元子，即召公之嫡孙。故该铭文记述了董这个人奉匱侯之

《诗·召旻》。

命，前往镐京向太保召公贡献食物，而受到太保赏赐，用作桓侯太子癸宝尊铸造或购置费用的事。由此可见，召公受封后的确并未就国，而留在周都辅弼王室，与《燕召公世家》记载相一致。

燕都故城遗址在今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已被考古学所证实。只是其南部已被圣水（大石河）冲毁。但从其残存部分来看，是一东西长约 3.5 千米的大城。从出土器物的铭文及其反映的文化面貌演化过程判断，这就是自召公元子克受封至因“山戎病燕”而被迫迁都临易之前的燕国都城，作为燕都的历史长达约三百年。若从周初召公元子克就封为封国都城的角度考察，燕都稍晚于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约 20 余年，合其迁都于蓟之后的历史也不应该是 3040 年。

由上所述，蓟与燕虽均是周初分封，但性质不同；因而决定了两城职能与规模的明显差异；前者是弱国小城，而后者却是方伯之国的大城。二城相互独立，客观并存。但燕都故城的衰落从根本上打破了幽燕地区两个中心城市对立并存的格局。

3. 燕都蓟城

在北方邻国蓟被山戎灭亡之后，燕首当其冲，成为山戎南下攻掠的直接对象。按《世本》，“桓侯徙临易”，燕国曾徙都。桓侯于公元前 697 年至 691 年在位，徙都应在此数年间，临易城位于易县东南易水之滨，故名。徙都原因是“山戎病燕”，迫于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故而向南迁徙。按《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外迫蛮貉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

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外迫蛮貉，按当时燕国地缘政治形势，主要威胁在春秋时期也还是山戎的不断南下。足证蓟已先期灭于山戎。从在滦平、延庆等地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山戎墓葬文化内涵来看，春秋初期山戎已进入奴隶社会，广泛使用了铜器，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铜戈、铜镞、铜马具的较多发现表明，山戎是一个长骑射、善攻掠、又拥有一定军事实力的部落。由《左传》、《史记》、《国语》、《管子》等古代文献常记载有山戎入关侵燕，甚至“越燕伐齐”的史实，燕国“几灭者数”显然与山戎南进有关。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之世系失载，亦可见春秋时期燕国在林立诸侯中政局不稳的事实。燕国迫于山戎军事压力迁都临易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徙都临易之后，燕国继续遭到山戎的攻击。据《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二十三年（燕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3年），山戎再次伐燕，庄公告急于齐。^①为雪“山戎越燕伐齐”之耻，也为借机争取霸主地位，“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一带。按《国语·齐语》、《管子·大匡》、《管子·封禅》等文献记载，桓公伐山戎，还同时征服了孤竹、令支（离支）、屠何等北方部族，使“山戎走”；“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②

桓公北伐的胜利，摧垮了山戎族的实力，甚至直到战国时期，燕北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

^①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山戎伐燕事在燕庄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664年。

^② 《管子·小匡》。

百有余戎 然莫能相一”，^① 仍处于分裂散居状态，从而解除了长达数百年的山戎不断南下侵掠的武力威胁。当时，燕庄公感激齐桓公救援之恩，执天子之礼送桓公返齐境，因有桓公开沟割燕庄公所至之齐地予燕及燕君从命“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② 的历史事件。由此亦可见，齐桓公北伐山戎对燕国意义之巨大；从而也为燕国迁都于蓟并北向拓展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燕庄公三十三年（公元前 658 年）死，子襄公立。襄公在位四十年（公元前 657 年至 618 年），燕国国力有所增强。按《韩非子·有度》：“燕襄王（按当为襄公）以河为境，以蓟为国”的记载，是时燕国已迁都于蓟。“以河为境”当时黄河下游歧分二支，在齐桓公割让齐地之后，燕国疆域即已到达流经今河北沧州的南支北岸，并维持到战国时期；“以蓟为国”，即以蓟城为国都。由此看来，临易作为燕国都城还不足半个世纪。而自迁都于蓟至燕灭于强秦，蓟城作为燕都长达四百余年。因此，蓟城自此而后又有燕都之称，且历久不衰，足见影响之深远。

自蓟国灭亡至燕襄公迁都于蓟，因山戎频繁南下抄掠，原作为蓟国都城的蓟衰落了大约一二百年的时间。燕国迁都于蓟，自然不会直接沿用已衰落了了的蓟都小城，但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平夷已残破的蓟都旧城，拓展重建；二是另选城址，规划新建。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说明，燕国迁都于蓟是在原有基础上拓展重建的。

^①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

^② 《史记》卷 32《齐太公世家》。

首先是在广安门外桥南约 700 米处，护城河西岸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战国与战国以前的文化遗迹，包括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陶鬲腿、饕餮纹残半瓦当等，其中后者被公认为燕国宫殿常用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其它古陶残片，年代最早接近于西周时代。^①

还在宣武区条帚胡同地表以下 7 米处发现了战国文化层，出土方折式“匱”字刀币 10 枚，伴出古代建筑构件饕餮纹半瓦当二件及许多细绳纹陶片。

其次，在北京城区西南部陆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井。1956 年发现 151 座，其中战国 36 座，汉代 115 座，以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最密集，计达 130 座；1965 年发现 65 座，仅内城西南角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就发现 55 座，其中西汉早期陶井 29 座；70 年代初又发现了一批战国至汉代的陶井。这些配合工程建设项目的发现，在空间分布上虽明显带有局限性，但仍然可以透视出陶井分布的范围大约就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蓟城城址所在。

再其次，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以南，在永定门火车站、天坛、陶然亭、蒲黄榆、宝华里、定安里一带，不断发现数量甚多的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其中 1973 年在法源寺附近、1974 年在白纸坊以北发现了两处战国墓群；1977 年在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发现了西汉墓等。墓群与上述陶井及建筑构件等一起为探索春秋战国至汉代蓟城城址提供了可靠线索。

依据上述考古资料提供的线索可以得到如下两点推测：

^① 赵正之：《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前的遗址》，《文物考古资料》1957 年 7 月。